



2005·冬

季三卷四期(总第十期)

九州學林

九州學林

九州學林

九州學林

九州學林

選登題



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



復旦大學出版社

Chinese Culture Quarterly

九州学林

题字：董阳孜



复旦大学出版社



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九州学林. 2005·冬季/郑培凯主编. —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 2006. 4

ISBN 7-309-04916-0

I. 九… II. 郑… III. 传统文化-研究-中国-丛刊
IV. K203-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13916 号

九州学林

郑培凯 主编

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

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

86-21-65642857(门市零售)

86-21-65118853(团体订购) 86-21-65109143(外埠邮购)

fupnet@fudanpress.com <http://www.fudanpress.com>

责任编辑 宋文涛

总编辑 高若海

出品人 贺圣遂

印刷 浙江省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890 × 1240 1/32

印张 8.625

字数 220 千

版次 2006 年 4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书号 ISBN 7-309-04916-0/Z · 55

定价 20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刊名题字：饶宗颐教授

封面诗：九州生气恃风雷，万马齐喑究可哀。

我劝天公重抖擞，不拘一格降人材。

——龚自珍《己亥杂诗》

编辑委员会成员(按繁体字版姓氏笔画原序)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王元化(华东师范大学) | 朱维铮(复旦大学) |
| 余英时(普林斯顿大学) | 吴宏一(香港城市大学) |
| 李欧梵(哈佛大学) | 李学勤(清华大学) |
| 李泽厚(香港城市大学) | 杜维明(哈佛大学) |
| 汪荣祖(台湾中正大学) | 周振鹤(复旦大学) |
| 周质平(普林斯顿大学) | 林毓生(威斯康辛大学-麦迪逊校区) |
| 孙康宜(耶鲁大学) | 高若海(复旦大学) |
| 宿白(北京大学) | 张信刚(香港城市大学) |
| 张隆溪(香港城市大学) | 张灏(香港科技大学) |
| 许倬云(匹兹堡大学) | 章培恒(复旦大学) |
| 傅申(台湾大学) | 汤一介(北京大学) |
| 叶嘉莹(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) | 葛兆光(清华大学) |
| 裘锡圭(复旦大学) | 刘再复(香港城市大学) |
| 刘述先(台湾“中央”研究院) | 郑培凯(香港城市大学) |
| 兴膳宏(京都大学) | 庞朴(中国社会科学院) |
| 罗多弼(斯德哥尔摩大学) | 饶宗颐(香港中文大学) |

常务编委(按繁体字版姓氏笔画原序)

朱维铮、张隆溪、郑培凯

主编

郑培凯

编辑部成员(按姓氏笔画序)

邓志峰 李天纲 张荣华 钱文忠 徐文堪

高 晞 高智群 傅 杰 廖 梅

香港编辑部召集人

范家伟(香港城市大学)

上海编辑部召集人

陈麦青(复旦大学)

发刊宗旨

《九州学刊》复刊了，《学术集林》也复刊了。最让人高兴的是，这两份学刊是合并复刊，重新正名为《九州学林》，希望能汇集海内外的学术资源，继续出版对中国文化研究有启发性的学术成果。合并之议源于王元化、朱维铮两先生。他们认为，当务之急，是汇聚内地、港台、海外的学者，共同办一份实事求是、言之有物的学刊，立足于实证的研究，放眼跨科际的整合，探索中国文化的宏观议题，却绝不为之时髦的理论框囿。这正是过去我主编《九州学刊》一直努力的方向。因此，一席话鼓动了我久已沉寂的学术理念，重新投入编辑工作，决心在《学术集林》与《九州学刊》过去的基础上，扩大学术研究的视野与触面，办好这一份阐释与开创中国文化的《九州学林》。

合并之后的《九州学林》将由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出版繁体字版，由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版，内容完全一致，同步发行，以期做到海内外同时共享学术研究的成果，沟通与联系国际汉学研究所关心的学术议题。

主编 郑培凯

目 录

唐史研究专号

伍伯常	从窆昭陵:论唐太宗的陪陵之制及其陪陵功臣	2
罗永生	从“玄武门之变”看贞观政权的形成	54
赵雨乐	论唐五代战将的单挑与骑斗	80
朱 红	唐代中秋新考	103
何方耀	汉唐中国佛门的“边地意识”与梵语学习热潮 ...	134

考 释

向德珍	《泉州千佛新著诸祖师颂》与《祖堂集》“净修 禅师赞”校录	160
贺 忠	《卖炭翁》新证	190

论坛

- 余英时 刘笑敢《老子古今》序 212
- 张求会 陈寅恪讲义《敦煌小说选读》相关问题续探 221
- 张 伟 陈寅恪首次留欧期间的一首佚诗 239

评论

- 沈国威 原创性、学术规范与“躬试亲验” 244

Table of Contents

Articles

Tang History

- Ng Pak-sheung Ministers in the Imperial Grave: Subordinate Burial at Zhaoling in the Early Tang 53
- Lo Wing-seng A Historical Survey: From the Xuanwumen Incident to the Creation of the Zhenguan Regime 79
- Chiu Yu-lok Fighting on Horseback: Jousting in the Lat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102
- Zhu Hong A New Study of Tang Celebrations of the Mid-Autumn Festival 132
- He Fong-yao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viction that "Ours Is a Border Area" and the Study of Sanskrit among Chinese Buddhists from the Han to the Tang 157

Textual Study

- Xiang De-zhen A Collation of *Quanzhou Qianfo Xin Zhu*
Zhu Zushi Song and *Jingxiu Chanshi Zan* in *Zu Tang*
Ji 189
- He Zhong A New Study of “Mai Tan Weng” 209

Forum

- Yu Ying-shih The Preface to Liu Xiaogan's *Laozi gu jin* 220
- Zhang Qiuhui A Study of Issues Related to Chen
 Yinque's “Dunhuang Xiaoshuo Xuan Du” 238
- Zhang Wei A Lost Poem Written by Chen Yinque during
 His First Visit to Europe 242

Review

- Shen Guo-wei Feng Tianyu's *Xin yu tan yuan* 244

唐史研究专号

从窆昭陵：论唐太宗的陪陵之制及其陪陵功臣

伍伯常

一、引言

在唐史研究的领域之中，帝王陵墓是一个备受学者注意的课题。然而，我们翻阅以往发表的研究专书或论文，即可发现大部分著作都把研究重点放在考古发掘、陵墓结构、建筑形式、碑铭整理和雕刻艺术及其象征意义等方面，涉及唐初陪陵制度起源发展、陪葬功臣出身背景及种族、地域渊源等问题的研究并不多见^①。本文的写作要点有二：透过有关史料的排比分析，以勾勒出唐太宗陪陵之制缘起发展的大致轮廓；胪列陪

^① 有关唐代帝王陵墓研究，王双怀用力甚勤，见氏著《荒冢残阳：唐代帝陵研究》，西安：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，2000。除了以上专书外，王氏亦著有以下三篇论文：《唐代帝王陵墓的基本结构》、《关中唐陵的石刻艺术》及《“唐陵之谜”新解》。三文收入氏著《唐代历史文化论稿》，香港：香港教育图书公司，2003，页319—435。刘向阳在这个研究领域也有专书刊行，见氏著《唐代帝王陵墓》（西安：三秦出版社，2003）。该书与王双怀的著述相同，都是以建筑艺术和帝陵史事作为研究重点。两位学者在其著作中引用不少考古发掘报告，这些资料，均有助于了解唐代帝王陵墓的建筑形式及雕刻艺术，读者可自行参考。岑仲勉在其《隋唐史》中亦有专章谈论昭、乾二陵，见氏著《隋唐史》上册，第九章《昭乾二陵及其特点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2，页141—146。

陵功臣的种族地域出身背景和所建立的勋业，以阐述唐太宗功臣集团的性质及地域特点。藉着以上两个要点的说明，盼可有助于了解唐太宗陪陵之制、陪陵功臣以及由此而反映的政治和军事意义。不同资料对陪陵功臣人数的记载互有出入，本文不拟多花篇幅考证，所选取论述的陪陵功臣共有四十四人，皆在《旧唐书》、《新唐书》有传。本文取用这个标准的原因，乃鉴于私人撰写的墓志铭和神道碑等资料，一向有虚美隐恶的毛病，翔实之处往往不及正史。因此，笔者以正史的记载为本，而将墓志碑铭所载的陪陵功臣事迹作为辅助材料。由于本文所关系到的人物甚众，而且每多涉及比例说明，所以笔者采用列表方式，辅以统计数字及相关解说，方便将重要论点清晰而系统地表达出来，以就正方家。

二、唐太宗陪陵之制的建立

唐太宗死后，下葬于昭陵。这个地点及陵墓修建工程，皆是他在世时选定和完成。《唐会要·陵议》载贞观十八年（644）：

太宗谓侍臣曰：“昔汉家皆先造山陵，既达始然，身复亲见，又省子孙经营，不烦费人功，我深以此为是。古者因山为坟，此诚便事。我看九峻山孤耸回绕，因而傍凿，可置山陵处，朕实有终焉之理。”乃诏曰：“《礼记》云：‘君即位而为椁。’庄周云：‘息我以死。’岂非圣人远凿深识，著之典诰，恐身后之日，子子孙孙，尚习流俗，犹循常礼，功四重之楮，伐百祀之木，劳扰百姓，崇厚坟陵。今先为此制，务从俭约，于九峻之上，足容一棺而已。木马涂车，土榇苇簣，事合古典，不为世用。又佐命功臣，义深舟楫，追念在昔，何日忘之。汉氏将相陪陵，又给东园秘器，笃终之义，恩意深

厚。自今以后，功臣密戚，及德业佐时者，如有薨亡，宜赐茔地一所，以及秘器，使窆窆之时，丧事无阙。”

至二十三年八月十八日，山陵毕。^②

引文反映唐太宗以汉代帝王预营墓葬为美事：既能亲自目睹，又可节省劳费。《唐会要》的小字夹注对昭陵的地理山势有以下说明：“陵在醴泉县，因九嵕层峰，凿山南面，深七十五丈，为元宫。缘山傍岩，架梁为栈道，悬绝百仞，绕山二百三十步，始达元宫门，顶上亦起游殿。”^③昭陵虽然要在险要的地势凿山修造，架设栈道，但它毕竟是依据山势而建，故相对于秦始皇和汉武帝的陵墓，所费的人力物力仍不算巨大^④。这一点可谓与太宗一贯提倡“戒厚葬”的做法相符^⑤。太宗对汉

② 王溥，《唐会要》，卷20《陵议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8，页395。

③ 《唐会要》，卷20《陵议》，页395。

④ 游师雄在北宋绍圣元年（1094）端午日到昭陵游玩，事后撰文志其事云：

“余观自古帝王山陵，奢侈厚葬莫若秦皇汉武，工徒役至六十万，天下赋税三分之一奉陵寝。秦陵才高五十丈，茂陵十四丈而已，固不若唐制之因山也。昭陵之因九嵕，乾陵之因梁山，泰陵之因金粟堆，中峰特起，上摩烟霄，冈阜环抱，有龙蟠凤翥之状，民力省而形势雄，何秦汉之足道哉！昔贞观十八年，太宗语侍臣曰：‘汉家先造山陵，身复亲见，又省子孙经营烦费，我深是之。我看九嵕山孤耸回绝，实有终焉之志。’乃诏先为此制，务从俭约，九嵕山上足容一棺而已。”见游师雄，《唐太宗昭陵图》，收入王昶，《金石萃编》，卷141，北京：中国书店，1985，页1上。

⑤ 唐太宗反对厚葬的言论，具见于贞观十七年三月所颁下的《戒厚葬诏》，详见宋敏求，《唐大诏令集》，卷80《典礼·丧制·戒厚葬诏》，上海：学林出版社，1992，页418。然而，唐太宗薄葬之论，只施用于臣民，其当父子大伦之际，仍不能免俗，以厚葬为美事。他为唐高祖经营山陵时说：“朕既为子，卿等为臣，爱敬罔极，义犹一体，无容固陈节俭，陷朕于不义也。”见董浩，《全唐文》，卷5《节省山陵制度诏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0，页1。

代帝王陵墓的赞许，不仅在于预营一事；与本文论点所涉尤深者，是汉代帝王赐葬功臣于山陵的惯常做法，被太宗称诩为“笃终之义，恩意深厚”。

《唐会要》的记载虽然明白道出唐太宗经营陵寝的目的和取向，但也存在着一些错误，故正确运用这条史料作历史研究之前，便必须先了解它的内容及文字来源：上引史文乃是节录不同时代的诏令而成，不仅在年代上有先后不同，内容要点亦不一致，以此诏为贞观十八年所颁下之说并不符合事实。引文所云“乃诏曰”至“不为世用”一段，乃基于太宗在贞观十八年以前颁布的《九峻山卜陵诏》成文：

夫生者天地之大德，寿者修短之常数，故生有七尺之形，寿有百龄为限，含灵禀气，莫不问焉。皆得之于自然，不可以分外企也。虽复回天转日之力，尽妙穷神之智，生必有终，皆不能免。是以《礼记》云：“君即位而为裨。”庄周云：“劳我以形，息我以死。”圣人之至鉴，通贤之深识，著之典诰，贻之话言，显说正词，曾无隐讳。末代以来，明辟盖寡，靡不矜黄屋之尊，虑白驹之过，并多拘忌，希慕遐龄。谓云车易乘，曦轮可驻，轨同趋异，其弊甚矣。有隋之季，海内横流，豺狼肆暴，吞食黔首，邑里凋残，鞠为丘墟。朕投袂发愤，情深拯溺，扶翼义师，以济涂炭。赖苍昊降鉴，股肱宣力，提剑指挥，天下大定。氛祲清殄，区宇平一，反浅弊于淳朴，致王道于中和。此朕之宿志，于斯已毕。犹恐身后之日，子子孙孙，尚习流俗，犹循常礼，功四重之楹，伐百祀之木，劳扰百姓，崇厚坟陵。今预为此制，务从俭约，于九峻之上，足容一棺而已。积以岁月，渐以备之，木马涂车，土梓苇簣，事合古典，不为世用。又佐命功臣，义深舟楫，或定

谋帷幄，或身摧行阵，同济艰危，克成鸿业，追念在昔，何日忘之！使逝者无知，感归冥寂；若灵魂有识，还如畴曩。居止相望，不亦善乎！朕是以使将相陪陵，又给以东园秘器，笃全终之义，恩意深厚，古人之志，岂异我哉！自今以后，功臣密戚及德业尤著，如有薨亡，宜赐茔地一所，加以秘器，使窆窆之时，丧事无阙。所司依此营备，称朕意焉。^⑥

《唐大诏令集》将这道诏文的颁布年月系于贞观十年（636）二月，《旧唐书》则以此在贞观十一年（637）二月才出现^⑦。《新唐书·太宗纪》亦载其事发生在贞观十一年二月丁巳：“营九峻山为陵，赐功臣、密戚陪茔地及秘器。”^⑧表面看来，《旧唐书》和《新唐书》的看法不符史实：贞观十年十一月，文德皇后葬于昭陵，太宗犹“念后不已，于苑中作层楼以望昭陵，尝引魏徵同观，使视之”^⑨；若昭陵在贞观十一年才卜地兴筑，文德皇后便不可能在卜地之前已入葬昭陵，太宗也不会引魏徵同观。笔者以为，《唐大诏令集》、《旧唐书》和《新唐书》的记载不一定存在着本质上的矛盾：太宗卜地九峻山为陵当发生在贞观十年二月，而贞观十一年二月下诏的原因，除了道出预营山陵的用意外，也表达他欲效“古人之志”以“笃全终之义”的想望，这也是《新唐书》何以突出太宗宠赐

⑥ 《唐大诏令集》，卷76《陵寝上·营卜·九峻山卜陵诏》，页390。

⑦ 刘昫等撰，《旧唐书》，卷3《本纪第三·太宗下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5，页46—47。《资治通鉴》（下文简称《通鉴》）亦袭用《旧唐书》的看法，见司马光撰、胡三省音注，《资治通鉴》，卷194《唐纪十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6，页6127。

⑧ 欧阳修、宋祁撰，《新唐书》，卷《本纪第二·太宗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5，页37。

⑨ 《通鉴》，卷194《唐纪十》，页6123。